

王韬史学成就及其 在中国近代史学上的地位

张立芹¹, 周文玖²

(1. 淮北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 安徽 淮北 235000; 2.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王韬是中国近代法国史研究的先驱,也是较早试图全面研究西方历史的学者,还是近代第一个没有官方背景走出国门对西方政治、经济、文化进行实地考察的中国史家。他撰写了许多西方史地著作,系统地书写了法国历史,记述了普法战争的始末,对当时东南亚、非洲、欧洲和日本的政治状况、社会风貌也作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和描述。王韬的历史著作,追求信史,采取了保存异说的方式;在体裁、体例上,坚持内容决定形式,不拘一体;他注重研究历史与关注社会现实的结合,所作史论充满经世思想;在表述上,他采取了骈散结合的手法,文字优美,同时还体现出较为突出的社会史意识和世界史意识。王韬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他的史学上承魏源、徐继畲,下启康有为、梁启超,是近代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关键词:王韬;历史著作;史学思想;近代史学史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7)01-0135-09

王韬(1828—1897),江苏新阳人。初名利宾,后易名瀚,字懒今。流亡香港后,更名为韬,字仲弢,自号天南遁叟,五十岁后又自称弢园老民。王韬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出生于有着浓郁儒家文化氛围的家庭,青年时代(1849—1862)为生计所迫,佣书于英国传教士主持的墨海书馆。后因上书太平天国事遭清政府通缉,被迫流亡香港,长时间受聘于英华书院,佐理英国人对儒家经典的英译,为中西文化的双向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①。1867年至1870年,他游历了法、英等国,回到香港后撰写了关于西方的历史著作,创办了历史上第一份由中国人主持的报纸《循环日报》。他晚年在上海主持的格致书院被誉为“中国近代新制教育之滥觞,更是近代科学教育之先驱”^{[1]90}。

王韬不仅是中国早期的改良主义思想家、政论家,更是一位重要的史学家;他既是中国近代史学上研究外国史地的先驱,又是较早走出国门实地考察西方社会的中国学者。从更加广阔的学术背景对他的史学成就及其在中国近代史学上的地位进行审视,我们自会有些新的认识。

一 王韬的学术规模和历史著述

王韬一生著述甚丰^②。他的著作涉及世界史地研究、中国历史研究、经学、文学、历法等多个方面,反映了他著述的勤奋和涉及学术领域的广博。王韬的著作大多是他1849年离开家乡后所作。他在家乡时的唯一作品是《眉珠庵词钞》,它是王韬早期的诗词集。

佣书墨海书馆时期,王韬编著的著作有《火器略

收稿日期:2015-09-18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近代中国改良主义史学研究”(2014SK12)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近代史学研究”(SKZZY2014032)之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立芹(1980—),女,江苏徐州人,历史学博士,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周文玖(1964—),男,山东金乡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说》2卷;《西学辑存六种》(含《西国天学源流》、《重学浅说》、《西学图说》、《西学原始考》、《泰西著述考》、《华英通商事略》);《春秋朔闰日至考》3卷;《春秋日食辨正》1卷;《春秋朔至表》1卷;《王韬日记》;《瀛海笔记》等。可见,王韬这一时期编写的著作,科技类书籍占有很大的成分,这与他帮助西方传教士翻译西书,对西方科技的了解程度日益加深并倡导科技救国的思想有关。

王韬在香港前期的工作是协助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经过共同努力,他们先后将《尚书》《诗经》《春秋》《左传》翻译成英文出版。从英、法等国回到香港后,王韬还著成《法国志略》初撰本14卷,《重订法国志略》24卷,删纂《法越交兵纪》1卷,《普法战纪》20卷,《漫游随录》3卷,《扶桑游记》3卷,《四溟补乘》120卷,《法志》8卷,《俄志》8卷,《美志》8卷,《西事凡》4卷,《乘桴漫记》1卷,《春秋左氏传集释》60卷,《皇清经解校勘记》24卷,《毛诗集释》30卷,《周易注释》,《礼记集释》,《台事窃愤录》3卷,《国朝经籍志》8卷,《弢园经学辑存》,《春秋经学三种》等。其中,《重订法国志略》《法越交兵纪》《普法战纪》《漫游随录》《扶桑游记》等在王韬生前已次第付梓刊行。从书目看,王韬这一时期的著述大体可分成两类:一是世界史地著作和游记,这与他旅欧、旅日的经历密切相关;二是经学著作,这是他协助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的副产品,因为在翻译中他遇到不少疑难问题,需要切实研究才能弄清,这类著作展示了王韬在传统学术方面的精深造诣。

王韬1884年返回上海后,创办了木刻活字印书局,名曰“弢园书局”,刊印自己的著作及其他故友、文人之作。这一时期,他新撰和刊刻的著作有《(绘图)后聊斋志异》12卷,《(白话绘图)后聊斋》1卷,《瀛寰杂志》6卷,《弢园文录外编》12卷,《弢园尺牍》12卷,《弢园尺牍续钞》6卷,《海陬冶游录》7卷,《淞隐漫录》16卷,《淞滨琐话》12卷,《遁窟谰言》12卷,《瓮牖余谈》12卷,《蘅华馆诗录》8卷,《老饕赘语》16卷,《漫游随笔图说》6卷等等。

王韬的未刊稿,有些藏于美国,如《春秋左氏传集释》60卷、《皇清经解校勘记》20卷、《毛诗集释》30卷均为手稿,现藏纽约市立图书馆;有的藏于台湾或民间收藏家之手,如《蘅华馆日记》6册;有的确知已经亡佚,如《弢园文录内编》等;有的则不知下落。^{[2]241-251}

一位学人一生有如此多的著述,这在近代是不多见的。近代著名新闻学家戈公振高度评价王韬说:

“其学识之渊博,眼光之远大,一时无两。”^{[3]153}此话用在说明王韬的著述规模上也恰如其分。

从上述著作可以看出,王韬的学术成就就是多方面的。他平生善于写诗,晚年编诗集《蘅华馆诗录》。诗词是他的抒怀之作,有些还是记述个人经历的史诗。他善于用诗叙述史实,相较于以后的夏曾佑、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等人开展的“新诗”运动,王韬的诗词似乎是他们倡导诗文改革的先声。王韬在文学上继承了蒲松龄的创作传统,使短篇小说的创作得以复兴。晚年他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写鬼神、异怪、艳妓、剑仙、道士的故事,“藉以抒平日之牢骚郁结”,在浪漫虚幻的背后,有现实主义的倾向,一定意义上折射了社会的黑暗和腐朽。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王韬的创作有所评论,他说:“迨长洲王韬作《遁窟谰言》,《淞隐漫录》,《淞滨琐话》各12卷,天长宜鼎作《夜雨秋灯录》16卷(光绪二十一年序),其笔致又纯为《聊斋》者流,一时传布颇广远,然所记载,则已狐鬼渐稀,而烟花粉黛之事盛矣。”^{[4]201}此寥寥数语,准确指出了王韬小说内容的特点及与之前文言短篇小说的差异。在传播西学方面,王韬虽然不像李善兰、华蘅芳,是杰出的科学家,但他在介绍西学,将西方科技知识介绍给国人上做出了很大贡献。他说:“近日西儒入中国,通览中国文字,著书立说者,纷然辈出,而皆具有精意,卓然可传。”^{[5]卷五·1}他的笔记体著作如《瓮牖余谈》包含许多此类内容。当时上海《字林西报》编辑主任蔡尔康评价他说:“吴郡王紫诠先生,博极群书……凡铁甲船、火轮船、火轮车、枪炮、飞天球之制,以及算学、化学、重学,无不融会于心。”^{[5]蔡尔康序·1}他与西方传教士合作翻译的《格致新学提纲》、《西国天学源流》等,内容包括天文、历法、算学、化学、重学、光学、地学、矿业、医学等。不仅如此,他还独自编辑科学书籍,如《西学图说》、《西学原始考》等,其传播和倡导西学之热心和努力,令人钦佩。在新闻方面,王韬创办的《循环日报》是中国近代第一份由中国人主办的报纸,他是卓越的新闻人,在新闻学理论和实践方面均有建树,是“中国记者之父”^{[6]82}。

王韬最大的学术贡献还是在历史学方面,这从上列其重要著述目录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其中《普法战纪》和《重订法国志略》是其代表作。值得注意的是王韬的未刊西史之作,包括《美利坚志》、《法兰西志》、《俄罗斯志》、《四溟补乘》、《西古史》、《西事凡》。这些著作对全面反映王韬的史学成就,特别是世界史研究成就,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美利坚志》、《法兰西志》、《俄罗斯志》与《法国志略》一样,是王韬撰写的国别史。《四溟补乘》是王韬非常珍视的一部书,王韬曾言,在他所有的著作中,“《四溟补乘》与《经学三书》卷帙最为繁重”^{[7]卷六,14}。该书凡120卷,王韬在《西学辑存六种》中曾谈及此书的史料来源、编纂原则、主要内容等,他说:

近日泰西通商各处,谈海外掌故者如慕维廉之《地理全志》,玛吉士之《地理备考》,徐松龛中丞之《瀛环志略》,魏默深司马之《海国图志》,最后出者谓日本冈本监辅之《万国史记》。丰顺丁雨生尚书亦有《地球图说》之作,乃从美国本译出,惜译者未得其人,尚俟采辑,始得成书。是书搜罗宏备,详于近而略于远,今四十年来所有国政民情,朝聘盟会,和战更革,诸大端无不一一备载,凡有关于中外交涉者,尤再三致意焉。^{[8]8}

这段话说明,《四溟补乘》记述的内容主要是近四十年的西方历史,参考资料包括慕维廉之《地理全志》、玛吉士之《地理备考》、徐继畲之《瀛环志略》、魏源之《海国图志》、日本冈本监辅之《万国史记》、丁日昌之《地球图说》等,在此基础上,博采旁搜,以详近略远为原则,而对“国政民情,朝聘盟会,和战更革”详细记载,对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尤其重视。王韬在与盛宣怀的信中曾谈及此书的撰述旨趣和未能付梓刊行的原因:

《四溟补乘》一书,即《瀛环志略》之后史,《海国图志》之续编也。网罗泰西之近闻,采取欧洲之实事,四十年来,耳目所及,靡不大小咸登,精粗毕贯。凡欲稔知洋务者一展卷间,即可了如指掌,此韬生平精力所萃,或谓为投时之利器,谈今之要帙,虽谢不敏或庶几焉。久欲付之手民,出以问世,俾世知徐松龛中丞,魏默深司马之外,复有识途之老马,以剞劂之费无从出,尚有所待。^{[7]卷六,2-3}

可见,王韬是抱有强烈的经世意识来编纂这部书的。但因为缺少资金,他未能将此书刊行。

王韬在《西学辑存六种》中也曾言及《西古史》和《西事凡》的主要内容、编纂原则,他说:

犹太为泰西名邦,其记上古之事,曰创世纪。谓自开辟至今五千余年,记载无讹,西国之史未若犹太之可信者也。余尝取而读之,其文诘曲鄙俚,难以尽晓,因为删繁去冗,成《西古史》四卷。于是疆域之沿革,世代之迁移,邦国之分合,学术之源流,皆可得而考鉴焉。^{[8]10}

就是说,《西古史》主要根据犹太教的历史资料,梳理西方国家的历史。在编纂中,王韬尤重记录“疆域之沿革,世代之迁移,邦国之分合,学术之源流”。《西古史》的内容是西方国家的古代史。

而《西事凡》则是对《西古史》的补充。如果说《西古史》的史料出于“正史”的话,那么,《西事凡》则主要利用野史及逸闻轶事撰写。王韬说:

余既以西国世代递嬗,邦国相争,入之正史。尚有遗闻轶事,足以供谈资者,别编四卷,曰《西事凡》。或有出于故老之传言,近今所追述,标新领异,阐幽摭奇,邻于稗官野史之说者,一并附焉!余尝谓西士通今而昧古,中儒爱古而薄今,苟能各矫其失,庶免彼此交讥也夫。^{[8]10}

在王韬看来,野史可以补充正史,中西治学方法也能互补,两者兼用写出的西方历史方能完善。由此可见,王韬的历史撰述,不仅表现在撰写国别史上,而且他致力于将西方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地撰写从古至今的西方世界之通史。

王韬作为早期改良主义的政论家为更多人所熟知,以致他的政论家身份掩盖了其史学家的名声。事实上,王韬的历史著作数量更多,而且即使是政论类著作、学术随笔、译介之作也与史学有关。他的政治主张和改革方案的背后都有其史学理论作支撑,他的世界观、价值观、政治观与他的历史观有着紧密的联系。并且,历史著述才是王韬学术的大宗。

二 王韬历史著述的特色

王韬历史著述的特点,一是其所涉及的领域新。王韬的史学贡献主要是对西方国家历史的撰述,在当时,西国历史对中国人来说,基本还是未垦的处女地,虽然已有《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但从19世纪后期中国人了解域外的需要来说,这些著作犹如杯水车薪。因此,王韬的西史著述,无论对当时的中国学术界,还是对当时的政界而言,都是迫切需要的耳目一新之作。二是作为长期与西方人合作又有深厚中国传统学术修养的学者,王韬的著述既吸收了西方史学的一些元素,又继承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兹以王韬的代表作为据,将其史学特色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追求信史,保存异说。王韬对于“求真”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有清醒认识,他说:“作史之道,贵于核实”^{[9]凡例,4},历史撰述应以求实为目的。王韬在进行历史撰述时,对于明显有矛盾的史料,采取了保存异说的谨慎态度。他明确写道:“普法军兴,各有随营

纪录之官,然或有一事而两国所纪各异者,今是书一并载之,用昭其允,虽未免嫌于层见叠出,而阅者自能辨其真贗所在。”^{[9]凡例·4}这是遵守中国传统史学存疑的原则。这样的例子在王韬的历史著作中有很多。如在《普法战纪》中,他在写“十一月三日国中公举德禄苏及廷臣者,凡五十五万七千九百七十六人”下有注释:“别本云四十四万六千人”;在写“不从者六万二千六百三十八人”下有注释:“别本云四万九千人”^{[9]卷九·19}。再如在《重订法国志略》中,王韬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的死亡:“过西士尼河,炎暑如毁,日帝与从者浴于河,忽发寒疾,殁于军。一说帝至迦里多河,桥隘,众兵争渡,帝立马待之,移时不能久俟,跃马乱流,水势迅疾,人马俱溺,众大惊,拯之已不及。”^{[10]卷三·13}到目前为止,史学界对于腓特烈一世的死亡原因仍未形成一致看法。王韬对史料采取审慎的态度,不轻易进行取舍,体现了他对信史的追求。

王韬在著作中,除直接议论外,还采取了先述时人观点,后发表自己看法——或赞同,或否定的方式,以保存当时人观点。这是保存异说的另一种方式。比如时人说:“法国朋党之兴,久为民患,惟拿破仑称制二十年,国富民乐,法人至今思之不置,其党必复享其利。”这一说法显然是值得推敲与商榷的。对此,王韬发表自己的评论说:“此亦从旁揣度之词也。”^{[10]卷八·19}王韬著作中多有“或谓”,“议者谓”,“或人所云”,“或又谓”等语,为后世学者了解当时的社会形势和舆论风向提供了材料。

第二,体裁、体例运用灵活。在体裁选择和内容编排上,王韬根据表述的需要,不拘成例、灵活安排,从而使《重订法国志略》、《普法战纪》在继承前贤的基础上,又别具风格。

《重订法国志略》采用了综合体的编纂手法。第一卷至第十卷,类似正史的本纪,写出法国历代政治沿革。但它不是纯粹的编年体,而是采用纪事本末体与编年体相结合的手法,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既做到线索清晰,又力求叙事完整。从十一卷至十四卷则采用了纪事本末体,写法国的外交状况。十五卷至二十四卷则运用书志体,叙述法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地理等。在编撰上,《重订法国志略》做到了以内容决定形式,灵活多变,不拘一体。

就体例而言,《重订法国志略》布局严谨,断限清晰,标目简明扼要。关于《重订法国志略》的断限,王韬明确写道:“今上自美罗万氏,下至首领麦马韩,上下一千五六百年,历代治乱兴废之迹,尽括之于十数

卷中。”^{[10]凡例·1}这是就《重订法国志略》总体断限而言。王韬又根据朝代的变迁,作了小的断限,依次为高卢时期、加洛林王朝时期、加佩王朝时期、瓦卢瓦王朝时期、波旁王朝时期、波拿巴王朝时期。这样,法国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清楚了,政治流变清晰可见。关于史书的标目,刘知幾曾言:“名以定体,为实之宾,苟失其途,有乖至理。”^{[11]85}刘知幾的意思是,名反映实,要与实相符。也就是说,史书标目须追求准确。章学诚说:“古人著书,往往不标篇名”,“其有篇名书名者,皆明白易晓,未尝有意为吊诡也”^{[12]163}。章学诚强调的是史书标目应朴实无华、让人明白其意旨。《重订法国志略》一书的标目简单、清晰、确切,符合先贤所言准确、朴实的要求。

《普法战纪》也是采取了纪事本末体、纪传体和编年体互相结合的手法,并充分运用了地图。既寓纪事本末体、纪传体于编年体之中,又使编年体服务于纪事本末体的内容要求,图的使用则济文字之穷,使普鲁士、法国的地理位置,普、法各战场的地理环境、军事布置,朗若列眉。这些地图的运用,既有助于读者详细了解当时情况,也有助于增加史著的表现效果。相对于中国古代史书不甚重视图的运用而言,这充分体现了王韬在历史编撰方面的见识。

在编排方面,《普法战纪》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编织出普法战争的历史图景,上起普法启衅,下迄于战争的结束。该书第十三卷以编年体的形式对普法战争进行总结,提纲挈领,条分缕析,使普法战争的始末得以清晰展现。另外,王韬还以传记的形式对普法战争中一些重要人物的生平进行介绍,如法王拿破仑三世,法国名将麦克马洪、巴赞,普鲁士首相俾斯麦、军师毛奇等。王韬能够根据表述的需要,灵活运用多种体裁。

第三,善于发表历史评论。王韬的史著,评论较多,历史评论的形式亦多种多样,主要有直接议论、卷中论、卷后论三种方式。

直接议论的方式,如《普法战纪》评论法国对普人的驱逐:

日耳曼人向时旅居法国,往来贸易,无异土著,兹为法官所逐者约二万,皆迁往瑞士,盖法国东境比邻也。瑞国官民无不待以厚礼,中有一妇最为老寿,年百有六岁,二十五岁时往居法京,至此盖八十一年矣,久居如此而仍复见逐,于以见法之薄于待人矣!^{[9]卷十·27}

日耳曼人旅居法国者,无论居住时间长短,则一

概驱逐出境。王韬在段尾直接发表议论：“法之薄于待人！”

卷中论、卷后论的方式为王韬所常用，主要是在卷中或卷尾以“逸史氏王韬曰”的形式，对所述内容进行评论，或发表感慨。在卷中论方面，如在“附法国奇女子若安传”后议论说：

若安提孤军，全名城，立孱王，存亡国，诚使男子作事如此，顾不伟欤？曾几何时，香消玉殒，英人一炬，焦骨可怜，英雄耶？儿女耶？堂堂中华，秦家白杆军安在，吾愿铸金事之。日本一等编修重野安绎曰，女子之长于战阵者，中国则有木兰，我邦则有丙绘，然较之若安，忠愤激烈，回天日于已倾，其系于国家之安危轻重者何如哉？求之前史，不特女子无其人，即男儿亦不可多得，斯世须眉，诚有愧于巾帼哉！^{[10]卷四·12}

若安就是贞德，王韬在此论中一方面对贞德英勇救国行为予以赞颂，对她被火刑的悲惨结局表示哀痛，另一方面他以明末的女将军秦良玉为例，慨叹当今中国缺乏这样的英雄人物。最后他又引用重野安绎的话，将贞德与中国之木兰，日本之丙绘相比较，再次突出贞德的英勇行为。在卷后论方面，王韬几乎每卷后面都发表自己的评论。如在第四卷卷末，王韬说道：

后加颁的氏一朝，外慑于强邻，内逼于乱党，国势机陞，几无一日之安。查理第六，孱暗粗犷，至于失国。查理第七，虽能于丧败之余，建兴复功，然亦庸主也。路易十一，横征暴敛，以至贵族大臣，多被极刑，而犹令其子目睹其惨，残忍严酷，抑何至于斯极哉？其不亡者幸耳！惟路易十二，信任贤相，节用爱民，轻刑薄赋，差强人意。法郎苏亚，自负勇略，好用兵，身为俘虏，犹不自悔，屡兴大役，卒无尺寸之功，徒足以病民耳，然则兵其可常用哉？欧史谓法于此朝，无一贤君，诚然哉！日本儒士，徒见其国家效法泰西，练兵讲武，将有远图，思勤远略，而以县琉球，侵番社，谋朝鲜，一试其锋，以为能自强矣，而不知其实外强而中槁也！日本与泰西诸邦通商开港之始，实于法为最睦，或亦渐染其遗习欤，呜呼，于法之穷兵黩武，不以为可戒，而反以为可法，此殆近于浮浪子弟，倡为尊攘纵横之说者，而不意出于儒士之口也，吾无取尔也！^{[10]卷四·26}

在这段评论中，王韬先是对瓦卢瓦王朝各个帝王的作为进行评论。他不仅就瓦卢瓦王朝各君主的行

为做论断，还由此联想到日本明治维新时的一些做法，最后表明自己的观点“吾无取尔也”。他的历史人物评论，颇具知人论世的意味，同时还有紧密联系现实的特点，从历史到现实，充分表达了他的历史见解和现实主张。

第四，文字表述优美。就历史文字的表达而言，刘知幾曾云：“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11]152}，“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11]156}，“史之为务，必藉于文”^{[11]169}。刘知幾认为，叙事的才能、技巧对于史书的撰写至关重要。清代学者章学诚继承并发展了这一观点，在《文史通义》中指出：“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12]266}，“古人修辞，非为观美，谓必如是始可以行运而传久也”^{[12]487}，“不文则不辞，辞不足以存，而将并所以辞者亦亡也”^{[12]225}。这些论述都表明了历史著述有赖于文采方可流传久远。王韬意识到这一问题，在进行历史撰述时，力求叙事生动、形象，文字优美。如他对亚田尼之战后的场面描写：

尸骸相枕，遍蔽道旁，皆前日所伤殒者也。昨夕天气寒冷异常，霜华遍地，日曝不消，其地停有病卒之车数辆，霜满其衣，拂之不去，其受伤之卒多有气未绝，而尚能言者，主笔之士行经其前，咸乞其作寄书邮，涕泣哀求，情殊可悯，士人慨然许之，顷刻间积至盈千，士人不能携挈，乃取死卒所枕皮筐二贮之，战场正在平原，一望靡际，行历两时许始竟。^{[9]卷十一·9}

从这段可以看出，王韬深受中国古代史学的影响，尤其是受到《左传》描写战争场面的影响，即注重战场气氛的描写。王韬把这次战争的残酷，兵士的无奈及对于亲情的眷恋，战争伤亡人数之众——帮伤者捎带的信件顷刻间便已盈尺，以致不得不用皮筐携带，战争的场面之大——一望无际，需要耗时两小时方能走完全程，静谧地呈现出来，犹如一幅凝重的图画，让人如临其境，感到沉重、凄惨。

王韬在行文时，还运用了骈散结合的手法，尤其是骈体文的大量运用，二字四字六字相间定句，两两对仗，词藻优美，韵律和谐，平仄起伏，如行云流水，艺术效果极佳。如他描述色当之役的残酷：“其间折肢、裂体、剖腹、披肠、断镞贯颅、飞丸入骨、纵横枕藉、殆不可辨，遗衣在地，血痕脑迹凝聚其上。肝胆隳于泥涂，骨肉膏乎草木。古今来争战之苦，未有如此者也。”^{[9]卷六·29}战死者的死亡惨状历历如绘，虽言简文约，却宛若在目。

第五,重视记述社会史的内容。王韬的历史著述,注意描述经济、科技及社会生活等,万象毕陈。这在《重订法国志略》中体现尤其突出。在经济方面,王韬以专节论述了法国“议定出入国款”、“法定岁中出入款项”、“预计国课货值出入各款”、“议减教俸禄”、“兵后丝业顿衰”、“国用附国债”、“税务”、“国债(此专计旧时所贷)”、“银肆附国债”等,这是传统典志所缺少的。除了对经济状况的整体论述外,他还写了法国金刚石、制糖业、蚕丝业、烟草业、葡萄酒业等行业的发展。在科学技术方面,王韬描述了点数机在法国博览会中的应用:

法国博览院汇刊清单,详载赛珍会次第来观之人数,司阍者于往来之人,不必心焉数之也!其间有一必由之路,路口设门,门有横木,入门者身甫抵木,木若让人向内而开,人过复向外而合,而木中之机已有记印。^{[10]卷十,38}

不依赖人力的计算,只依靠机器运作便可记下参观赛珍会的人数,这无疑对王韬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此外,王韬还写了波旁王朝“学问日开”的状况,法国“新建博物院告成”、“新更丧礼”、“测金星过日环”、“创行博览会”、“禁报馆妄言”、“赛珍会奖赏”及法国的礼俗、学校、学术、邮政、刑律、藏书库、书院等学术文化状况;写了法国的绳技、斗马、秋千戏、戏馆乐院、游玩所、贫人屋、赛鸽会、气候物产、种类方言、生计、制作等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王韬的撰述,内容广泛,文笔生动,其中一些子目写得甚为详赡,展现了法国人民的社会生活风貌,体现了王韬较为突出的社会史意识。

第六,具有开阔的世界史意识。王韬的法国史撰述并非仅仅囿于法国一国状况,其立足命意在于欧洲全局、进而至于中国。他在《普法战纪·前序》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余之志普法战事,岂独志普法哉?欧洲全局之枢机,总括于此矣!”^{[9]前序,1}他言普法关系及欧洲局势云:

法若为普属,则陆有骑军,水有战舰,甲兵愈精,疆宇益扩,荷、比、西、普诸小国无不环拱而听命,而英、奥必自此多事矣。况南北日耳曼久已推普为盟主,联若一体,将来之执欧洲牛耳者,非普其谁?英岂复能倔强如昔而驰骋乎域外哉?尤可虑者,米利坚之眈眈日伺其侧也,苟其逞兵于疆场之间,必致伏戎于萧萧之内,殊可为英危已,故昔之英法常相攻,以欧洲列国皆不如英法之强也,今之英法常相合,以如俄如普不独与之

相抗,且足以相制也,俄与普亲,英与法比,四国并峙而称雄,法弱而英势孤矣!此欧洲近时将变之局也!窃以为此正天兴我中国,振兴自励之机也……英雄智奇之士奋发为雄,洞悉枢机,揣摩政要,俾百废具举,内之理财足食,外之讲武强兵……无难驾乎西人而上之,不必言攘剔,不必兴挾伐,而自能使西人桀黠傲睨之态默消于无形。^{[13]卷八,9-10}

王韬由当时法普之间关系的强弱变化,认识到将来普国将执欧洲之牛耳,意识到“法弱则英不能独雄”、美国壮大对英国也是一个威胁等等,看到欧洲局势对英国的不利;继而以法国历史为主线,叙述了法国与普鲁士、英国、西班牙、葡萄牙、俄国、奥地利等国的关系,扩展至整个欧洲的局面以及欧洲局势的变化对于中国的影响,王韬开阔的世界史意识由此可见一斑。

三 王韬在中国近代史学上的地位及影响

王韬在中国近代社会具有非常独特的地位,因而在近代史学上的重要性也由此显现。

首先,王韬是最早走出国门的近代史家。从鸦片战争(1840)到王韬游历泰西(1867),真正出国的中国人很少,林鍼和罗森,斌春和志刚,可谓是代表出国的两种类型,前者是出于谋生,后者为国家派遣;前者出身市井,后者隶属八旗,“思想见解都无足称,其载记的价值大抵只在记录见闻”^{[14]328}。唯一能与王韬学识相匹配的只有容闳,而容闳算不上史学家。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蒲安臣使团出使西洋是在王韬出国的次年。郭嵩焘被清政府作为驻欧公使派往英国更是比王韬出国晚了八年。郭氏把王韬尊为中国的“欧洲通”,临行前,特赴香港拜见,从他那里了解即将出使的西方世界。所以,王韬的这次出国,不仅是他人生的一次重要转折点,也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诚如他本人所言:“余之至泰西也,不啻为先路之导,捷足之登。无论学士大夫无有至者,即文人胜流亦复绝迹。”^{[15]10}王韬走出国门,到欧洲进行实地考察,直接受到西学熏陶,追求西学之真谛,这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王韬是少有的没有从政背景的改良思想家和史学家。王韬关于社会改良的思想,大都是通过他在《循环日报》所撰写的政论发表出来的。戈公振说:“该报有一特色,即冠首必有论说一篇,多出自王氏手笔。取西制之合于我者,讽清廷以改革。《弢园文录外编》,即集该报论说精华成之。”^{[3]153}中国的早期资

本主义改良思想,大都与洋务派有关,改良思想家基本都有从政的背景,但像王韬这样,通过考察西方国家现状,通过新闻媒介宣传社会改良的纯粹学者,却极为少见。这也决定了他视野的开阔和观点的别出心裁(当然,王韬作为“在野”文人,经济政治上都需要“朝里人”的帮助,这又限制了他关于改良思考的思想高度)。王韬的史学著作,之所以能够紧扣时代的脉搏,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与他的报人身份有关。但从史学的角度看,他的政论,又具有深厚的史学底蕴,有着史论的特点,是他史学思想的重要表现,他的社会改良思想与他的史学思想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再次,王韬的《法国志略》是近代中国人编写的第一部西方国别通史,《普法战纪》也是近代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欧洲当代史。前者注意用比较的方法说明欧洲历史经验的资鉴意义,后者以联系的观点揭示了欧洲的历史变动对中国社会将会产生的影响。二书不仅代表了当时中国史学界对欧洲史地研究的新水平,而且体现了鲜明的史学经世的时代精神。

最后,王韬也是较早试图全面研究西方历史的史学家。除了《普法战纪》、《法国志略》,王韬还有不少关于西方历史的著作没有出版,如《西古史》、《西事凡》、《四溟补乘》、《美利坚志》、《俄罗斯志》等。这些著作不仅注重西方近现代史,也上涉西方古代史;不仅有古代西方各国经济、政治、疆域的历史,还包含西方古代的科技、宗教、建筑、文学、商业等方面的内容。它们大都酝酿于王韬在上海墨海书馆时期,因此将王韬视为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先驱,当无异议。

王韬的这些独特性表明,他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最能领导时代潮流的史学家,他的史学著作是近代中国早期改良思潮在史学上的典型反映。

中国近代史学的重要课题之一是探究中国之外的世界史地,而王韬的史学正是这个方面的标志性成果。瞿林东先生说:“从《四洲志》到《海国图志》是一个飞跃,这是中国史家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撰写成世界历史地理著作。中国人借助这部著作的影响,在困惑中开始走向世界。从《海国图志》到《法国志略》、《日本国志》又是一个飞跃,这是中国史家第一次完整地分别撰写出东、西方两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并由此通过比较而初步认识到中国落后了。”^{[16]466}王韬史学的地位由此可见。

从中国史学发展的前后联系看,王韬史学是近代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即:上承魏源、徐继畲,下启康有为、梁启超。

他对魏源、徐继畲的继承主要表现在外国史的撰述上。林则徐被称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的《海国图志》是在林则徐译编的《四洲志》基础上编纂而成的,徐继畲的代表作是《瀛环志略》,这两部著作可谓19世纪四五十年代关于外国史地的代表作。王韬对二位作者都很尊敬,对这两部著作给予很高的评价,他曾经为《瀛环志略》作序,曰:“近来谈海外掌故者,当以徐松龛中丞之《瀛寰志略》、魏默深司马之《海国图志》为嚆矢,后有作者弗可及已,以视明季所出之《坤輿图说》、《职方外纪》,其详略为何如哉?此诚当今有用之书,而吾人所宜盱衡而瞩目者也。此二书者,各有所长,中丞以简胜,司马以博胜。顾纲举目张,条分缕析,综古今之沿革,详形势之变迁,凡列国之强弱盛衰,治乱理忽,俾于尺幅中,无不朗然如烛照而眉晰,则中丞之书,尤为言核而意赅也。”^{[17]226}王韬所评洵然中肯,然二书还有一些不足。其最明显的一点不足是它们的资料来源,主要还是根据西方传教士编译的外国史地书籍和地图,史料考辨方面还比较粗糙;再者,它们重视地理的内容,历史的内容则居于从属地位;其三,它们在“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指导下,侧重从“技”的方面介绍西方,对西方社会的制度、经济、文化等方面重视尚显不够。这些在王韬的著作中则有了很大改观。魏源、徐继畲的著作当年都对日本产生了很大影响,然而,王韬的著作出版后,日本学人对其评价更高。栗本锄云、重野安绎等学者认为王韬胜过魏源,究其原因,与王韬所接触的更加丰富的史料,特别是与他的西方见闻有很大关系。

王韬对康有为、梁启超的下启作用也主要表现在史学思想方面。

首先,王韬的历史变易观与康有为托古改制思想有一定的关联。王韬依据中国传统的变易观强调历史的“变”。他说:“《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知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也。上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古。中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三代……三代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自明季利玛窦入中国……至此而又一变。”^{[17]11}他对泰西人士认为中国缺少变化的观点进行了驳斥:“泰西人士尝阅中国史籍,以为五千年未之或变也。夫中国亦何尝不变哉?巢、燧、羲、轩,开辟草昧,则为创制之天下;唐、虞继统,号曰中天,则为文明之天下。三代以来,至秦而一变;汉、唐以来,至今日而又一变。西人动讥儒者墨守孔子之道而不变,不知孔子而处于今日,亦不得不一变。”^{[17]9}也就是说,

即使是孔子,假如他活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也会要求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社会制度而进行变法,这实际上是把孔子作为一个改革者的形象来塑造,已有“托古改制”的味道,为以后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开了先河。

其次,王韬对“大同”的宣扬与康有为也有诸多相似之处。他说:“‘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而即继之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此之谓大同。’”^[17]王韬的大同思想,其重要学术资源是儒家大同的思想,但可能也受到西方传教士的影响^[18]⁹⁰。康有为对大同思想的宣传力度更大,其大同思想也更加系统,他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公羊学,认为社会的发展要经过“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最后进入“大同”,三个阶段是递进的,不可逾越。因此,他认为社会只能一步步的改良,而反对革命。在这一点上,王韬与他是一致的。王韬的大同思想,应是康有为大同思想的先导。虽然王韬并没有明确说过自己属于公羊学派,但由他与著名的公羊学者龚自珍的儿子是密友来推测,他的变革思想很可能受到公羊学说的影响。

有意思的是,王韬与康有为还真发生过联系。据说1895年,英商汉璧礼捐银六百两,委托广学会以“何为当今中国变当务之急”为题,向全国征文,王韬任评委主任,康有为参加了征文,获得了末奖^[19]^{导言,7}。1895年9月,康有为到上海成立“上海强学会”,特地托郑观应引介,拜会了宣传变法改良的前辈王韬,王韬对康有为的主张和活动均表示支持,这在某种意义上

上也可看作是早期改良派学者向变法维新实际运动者的一次思想上的交接。

康有为对公羊说的阐释和变法改良思想的宣传,是中国人接受西方进化论的一种形式,因为在他写作《孔子改制考》的时候,就已读过一些关于西学的书籍及严复编译的《天演论》,公羊学说不过是他宣传进化史观的工具。而在王韬那里,西方进化论的思想还不是很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说,康有为的史学思想,又明显地超越了王韬。

作为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所做的史学工作更多,对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作用更大。1902年,他的《新史学》的发表,标志着中国近代史学的诞生。梁启超对王韬的史学成就非常重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特别是他的两部法国史著作,认为“皆足观”。他在《读西学书法》、《西学书目表》、《西学书目提要》中,对王韬的史著都大力推荐。可见,王韬的史学著作,作为近代史学的重要成果,对“新史学”的孕育产生了重要作用。

美国史家柯文从文化变化比率的视角比较王韬与孙中山。他说:“虽然孙中山代表了革命进程的稍晚阶段,在这种意义上他比王韬要新。但若就他们个人一生所包括的文化变化容量而言,从代际变化的相对观点(而非累积或展望的观点)来看,王韬却比孙中山要新。”^[18]³柯文所论,不无道理,王韬虽然没有成为一个革命者,但却是一个开创者。而且,从推进史学发展的意义上说,柯文的这种对比,用在王韬与康有为、梁启超的比较中同样合适。

注释:

- ①关于晚清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成果,重要者有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汪寿松的《晚清西学东渐与海外汉学研究述论》(《天津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赵少峰的《广学会与晚清西学东渐》(《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2期)等。
- ②吴静山在《王韬事迹考略》(《上海研究资料》,上海通社1936年编印)中指出,王韬60岁之前的著作共40余种。而实际并不止于这个数目。据统计,王韬一生著作大概有59种,已经付梓刊行的有39种,未刊的有20种。

参考文献:

- [1]王尔敏.上海格致书院志略[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
- [2]折平.王韬评传[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 [3]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 [5]王韬.瓮牖余谈[M].上海:申报馆,清光绪元年(1875).
- [6]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7]王韬.弢园尺牍续钞[M].上海:淞隐庐,清光绪十九年(1893).

- [8]王韬.西学辑存六种[M].上海:淞隐庐,清光绪十五年(1889).
- [9]王韬.普法战纪[M].遁叟手校本.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刊行.
- [10]王韬.重订法国志略[M].上海:淞隐庐,清光绪十六年(1890).
- [11]刘知幾,浦起龙.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12]章学诚,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 [13]王韬.弢园尺牍[M].上海:淞隐庐铅印本,清光绪十九年(1893).
- [14]钟叔河.从东方到西方——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M].长沙:岳麓书社,2002.
- [15]王韬.漫游随录[M].顾钧校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 [16]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 [17]王韬.弢园文录外编[M].上海:上海书店,2002.
- [18]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M].雷颐,罗检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 [19]王韬.弢园文新编[M].李天纲编校.上海:中西书局,2012.

WANG Tao's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and His Status in Chinese Modern Historiography

ZHANG Li-qin¹, ZHOU Wen-jiu²

(School of History and Society,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Anhui 235000;
School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WANG Tao was not only the pioneer in French history study, but also one of the Chinese scholars attempting to comprehensively study the western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He was one of the first historians that had no official background to go aboard investigating Western politics, economies and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He wrote many books on western history, described the French history, introduced the information of the Franco-Prussian war, recorded the southeast Asia, Africa, Europe and Japan's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social environment. WANG Tao adopted different ways in writing history. In both genre and style, he adopted different form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ontents. He combined history study with social reality. His history comments were filled with classic thoughts and his historical writings were ones with beautiful narrative styles and also reflected prominent viewpoints of social history and the world history. WANG Tao rested on the special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his historiography, learning from former scholars such as WEI Yuan and XU Ji-yu while enlightened the followers such as KANG You-wei and LIANG Qi-chao, it was an important link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Key words: WANG Tao; historical works; historical thought;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iography

[责任编辑:凌兴珍]